

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二卷 明治維新

信夫清三郎 著
周啓乾 等譯



桂冠政治學叢書

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二卷

明治維新

(日) 信夫清三郎著

周啓乾 呂萬和 熊達雲譯

桂冠圖書公司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近代政治史／信夫清三郎著；周啓乾譯。

-- 初版.-- 臺北市：桂冠，1990〔民 79〕

冊； 公分.--(桂冠政治學叢書；

18-21)

含索引

ISBN 957-551-137-9 (一套：平裝) . --

ISBN 957-551-139-5(第二冊：平裝)

1. 日本—歷史—近代(1863-1875) 2. 政治—日

本

731.26



桂冠政治學叢書[19]

日本近代政治史(二)

原 著／(日) 信夫清三郎

譯 者／周啓乾

執行編輯／萬嘉玲

發行人／賴阿勝

出 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 10769 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 話／3416949・3631407

電傳(FAX)／886-2-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1166 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 年 12 月 (印數：1~1,00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定 價／新臺幣 300 元

ISBN 957-551-137-9 (套)

ISBN 957-551-139-5 (第二卷)

凡 例

一、本卷敘述方法依第一卷凡例。其中，關於事先聲明「爲避免煩瑣起見，原則上不註明引用資料的出處」這一點，有人批評說這樣做是「缺乏誠意」。其實，表明作者對讀者是否懷有誠意的，並非註明資料出處，而在於作出索引，因爲索引能夠幫助讀者不斷使用此書。註明資料出處，乃出於作學問的良心而爲，和對讀者是否懷有誠意並無關係。對此，日本的學者往往把問題搞錯。在卷末列出文獻目錄，雖也爲讀者提供了方便，但其本來目的，乃在於說明自己著作的根據，甚至包括了在正文中沒有直接引用的文獻。爲讀者在研究工作上提供文獻知識的固有手段，乃是學術情報工作。

二、雖然在上一卷中沒有說明，但本書對中國使用了特殊的稱呼。在本書中，貫通全卷的「中國」一稱，是對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的略稱。因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大清國時期，故說到國名時略稱「清國」。至於泛稱清國和中國的時期，或者談到與國名無關的地區時，則使用「支那」的稱呼^①。過去，日本稱鄰邦中國爲「支那」時，曾有侮蔑的含意，因此在中國都討厭「支那」一稱，然而，本書使用「支那」一稱，乃是考慮到已對「中國」一稱限定了涵義。

^①根據我國習慣，在多數情況下對「清國」、「支那」仍譯作「中國」。

三、在德川時期，今天的大阪寫作「大坂」，函館寫作「箱館」。據近代史專家藤本篤《大阪府的歷史》《縣史叢書》第27種，山川出版社，1969年，第235～236頁）所說，在德川時期的記載中，有的也寫作「大阪」，但一般都寫作「大坂」；至明治初年，則「大坂」和「大阪」混用，官印也有兩種；在公文中統一寫作「大阪」則是明治十年前後的事。箱館改稱函館的經過是這樣的：明治二年八月，政府把德川時期的「蝦夷地」改稱「北海道」；九月，東久世通禧以開拓長官之身分到箱館赴任，於九月三十日將「箱館」改稱「函館」（榎本守惠、君尹彥：《北海道的歷史》，《縣史叢書》第1種，山川出版社，1969年，第117頁）。不過，本卷除引用當時文章外，一律統一為「大阪」和「函館」，「蝦夷地」也統一作「北海道」。

序

1

本書是我把近代日本政治史作為通史來敘述的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的第二卷。本卷的主題是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的主要內容是，為應付西歐的衝擊而出現的民族革命與「國民」(nation)的形成。政治史家岡義武在其1962年出版的《近代日本政治史》(第一卷，創文社，第113頁)中指出，明治維新中的「巨大的政治變革是以民族革命為其重要側面的」。我在本書本卷中，則繼承了岡的論點，把明治維新作為民族革命及國民形成的過程來加以敘述。本卷所敘述的內容，是繼第一卷所述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公元1863年9月30日)公武合體派對尊王攘夷派發動軍事政變之後，先作若干序論性的敘述，然後便從文久三年八月的天誅組之亂談起，直至明治八年(1875年)十一月《明六雜誌》停刊時止。關於明治維新的歷史過程，我的基本觀點大體如下。

一、朝藩體制①(日本曆慶應三年②十二月～明治二年③六月)。

這是從王政復古④至奉還版籍⑤的過程，也是法律史學者福島正夫所說的、由代替了幕藩體制的「朝藩體制」進行統治的

①朝藩體制，指朝廷和各藩結成的統治形式。

②慶應三年，即公元1867年。

③明治二年，即公元1869年，以下類推。

2

時期（參見福島正夫的《地租改正》，《日本歷史叢書》第21種，吉川弘文館，1968年，第57頁）。幕府雖由於奉還大政⑥和獻出江戶城而垮台，但對朝廷的反抗却猶未終止，遂展開了戊辰⑦戰爭；即使在朝廷的統治之下，當時語言中所說的「大權」（朝廷）與「小權」（各藩）之間，仍然存在著對立狀態。朝藩體制就是作為大權的朝廷和作為小權的各藩孕育著相互之間的對立而形成的體制，它雖與幕藩體制不同，是以旨在應付西歐的衝擊形成能和「萬國對峙」的統一國家為基本目標的，但嚴格地說，並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即絕對主義國家。

二、神政⑧絕對主義（日本曆明治二年七月～明治四年七月）。

明治二年五月，隨著函館戰爭⑨的結束，戊辰戰爭即告結束。在此前後，朝廷召開了東京會議——正式名稱為上局⑩會議。它一方面使軍事政變計畫伴隨而來，另一方面則根據王土王民的思想，斷然決定奉還版籍，以祭政一致⑪為原則，建立統一的國家。為祭政一致的統一國家奠定了基礎的意識形態，乃是國學，而把國學者的活動同朝廷相聯繫的媒介，則是公卿岩倉具視。把國學

④王政復古，日本自鎌倉幕府以後，由將軍掌握政治實權，天皇反受將軍的控制，而王政復古即指政治實權交還天皇。

⑤奉還版籍，指迫使封建領主把領地交還天皇。版即版圖，指領地；籍即戶籍，指人民。

⑥奉還大政，指將政權歸還朝廷。1867年11月9日（日本曆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將軍慶喜辭去「征夷大將軍」職務，將政權「奉還」朝廷。其後天皇又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廢幕府，結束了六百八十三年之武家政治。

⑦戊辰，1868年為舊曆戊辰年。

⑧神政，即神權政治，指政治統治者又作為神的代表，擁有絕對統治權力的一種統治形式。

作為思想體系的統一國家的出現，便宣告了以天皇為頂點的絕對主義國家的出現。之所以把日本的絕對主義說成是「神政」，就因為它是祭政一致的「神權政治」(theocracy)，與以「君權神授論」(Divine Right of Kings)●為根據的歐洲的絕對主義相比，有其鮮明的特徵。當時，最準確地揭示了日本絕對主義這一特徵的，是啓蒙思想家加藤弘之⑩。他對朝廷統治賦予「神權政治」的特徵。

三、啓蒙絕對主義(日本曆明治四年七月——明治八年一月)。

在天皇之下建立了統一國家的朝廷，開始實行有利於和世界各國對峙的富國強兵的國家建設。能夠設計富國強兵計劃的，已經不是國學者，而是洋學者。明治四年七月，朝廷通過廢藩置縣⑪最終地廢除了藩國制度。之所以將同年同月視作絕對主義由神政絕對主義轉向啓蒙絕對主義的劃分時期的點，是因為以洋學者身分任官職的一批啓蒙思想家，在此前後廣泛參加了籌劃富國強兵政策的工作，同時國學者的影響顯著下降。啓蒙絕對主義，乃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後進的東歐各國為追趕先進的西歐各國，

⑨ 函館戰爭，1868年10月至1869年5月，以榎本武揚為首的幕府軍隊占據函館五稜郭，建立臨時政權，對抗官軍，終於失敗。

⑩ 上局，明治初年掌管立法的議政官之機構，相當於上院。

⑪ 祭政一致，也稱政教合一，指祭祀神靈與國家政治相一致思想和政治形態，即所謂神權政治。

⑫ 君權神授論，稱君主權力是神所授予的學說。

⑬ 加藤弘之(1836~1916)，原為但馬(今兵庫縣北部)出身的武士，幕府末期任開成所教授，明治維新後任天皇的侍講。其後，曾任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和樞密顧問官。最初提倡「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後又反對建立民選議會。有《真政大意》、《立憲政體略》、《國體新論》等譯著。

⑭ 廢藩置縣，1871年，明治政府最後廢除藩國制度，取消封建領主的統治權，將全國行政區重新劃分為三府七十二縣。

- 3 汲取啓蒙思想，有志於以西歐化來實現近代化而產生的絕對主義的合理形式。日本的絕對主義動員了啓蒙思想家，來編纂法典，制定學制和徵兵制，改革地稅，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正可同普魯士及奧地利等東歐各國啓蒙絕對主義進行的改革相媲美。在日本，最典型的代表啓蒙絕對主義的政治家是江藤新平^⑤；把啓蒙絕對主義加以理論化的思想家則是加藤弘之。明治六年，啓蒙思想家組成明六社，出版《明六雜誌》，出現了啓蒙主義時代。

四、立憲絕對主義（日本曆明治八年二月～）。

啓蒙絕對主義雖然通過西歐化和近代化來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進行能與世界各國相對峙的國家建設，但廣大人民在政治上仍然陷於無權狀態。如果不把廣大人民從政治、社會特權之下解放出來，形成「國民」，那就完成不了能與世界各國對峙的國家建設。形成國民的運動，從兩個方面開始。明治五、六年歷訪歐美各國的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試圖以憲法和議會為媒介形成國民。明治六年，在「征韓」論爭中失敗並下野的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和江藤新平四參議^⑥，要求自由和民權，提出了形成國民的綱領。形成國民的運動由於佐賀之亂^⑦及台灣戰爭^⑧時進時退。但是，明治八年二月，木戶和板垣就憲法和議會問題在大阪開會，進行了協商；五月，作為大阪會議的結果，由政府以天皇名義頒布建立立憲政體的詔書，這都是重要的劃時代事件。這時，在形成國民的運動中掌握主導權的是木戶孝允，為木戶提供形成國民的理論，並對木戶在形成國民過程中的政治力量寄予期望的思想家是福澤諭吉。木戶一方面保持絕對主義的「專制」本質，另一方面，則要以建立立憲政體，來使絕對主義適應

⑤ 江藤新平(1834~1874)，原為佐賀藩（位於九州西北部）武士，明治維新後任文部大輔、司法卿等職，主張征韓論並建議召開民選議會，下野後在佐賀率兵叛亂，被處死。

新的形勢。日本的絕對主義的一大特徵，就在於它令人驚奇之對新局勢的適應能力。啓蒙絕對主義開始過渡到立憲絕對主義。啓蒙思想家將《明六雜誌》停刊，從而自我結束了啓蒙主義的歷史作用。

本書敘述的內容，也就在這裡結束。關於立憲政體如何建立，國民怎樣形成，以及「明治時期的日本」顯示出怎樣的面貌，則都是下一卷的主要內容。

自本世紀二〇年代以來，對於明治維新史的研究已花費了五十多年的時間，但仍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在指導明治維新史研究的遠山茂樹，把制定學制、徵兵制和改革地稅視為明治維新的「三大改革」。對於它們的歷史意義，他在1969年所著《明治維新》（《國民的歷史》第十九卷，文英堂）一書中，曾經這樣寫道：

「……認為明治維新是資產階級革命（市民革命）的見解，其有力的根據就在於這三大改革。對於不這樣看待明治維新的見解——作者也持此立場——來說，最大的難點即在於對這些改革的評價。……換言之，我認為，否定明治維新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人，還沒有提出能夠充分說服對方的史實和理論。」（第62～63頁）

遠山茂樹誠實的史論，對經常考慮這一問題的我提供了豐富的食糧。解決關於明治維新歷史性質爭論的關鍵，正在於如何評價遠山所說的「三大改革」。

⑩參議，明治初年的官職，位在左、右大臣之下。

⑪佐賀之亂，1874年2月以江藤新平為首的佐賀士族發動叛亂，隨即被平定。

⑫台灣戰爭，1874年日本政府以台灣人民殺害琉球漂流者為藉口，武裝侵略台灣。

河野健二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集體從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他自己著有《法國革命小史》（《岩波新書》第348種，1959年），對於日本歷史，也有很深的造詣，著有《福澤諭吉——永生的思想家》（《講談社現代新書》第110種，1967年）。他以觀察歐洲革命史的眼光來研究日本的明治維新，批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研究，於1966年出版《法國革命與日本》（《日本廣播協會叢書》第43種，日本廣播出版協會），針對關於明治維新史的爭論，提出了最尖銳的看法。河野把法國革命與明治維新加以比較，認為「可以概括地說，法國革命是以民主主義革命為目標而獲得成功的，但明治維新則不如說是停留在民族主義革命的範圍之內」，強調「明治維新只把自己的任務限制在實現民族主義上，這只不過是實現民主主義的前提」。然而，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如下論述：

5 [……明治維新絕非與民主主義無關。從某種見解看來，除了明治四年至明治七年的短時間外，在此前後的維新時期中占統治地位的潮流，乃是注重『輿論公議』的議會主義。』（第198頁）

然而，正是在河野認為與民主主義「無關」的明治四年至七年的「短時間」內，政府卻實行了遠山所說的三大改革，正確說來，加上編纂法典一項，乃是四大改革。河野認為，確認了土地的私人占有的地稅改革，乃是打算「破壞和消除封建制度」，因而明治維新和法國革命一樣，「在主張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點上，是它的核心」（第161頁）。這樣，我就不揣冒昧，請問河野，與「民主主義」「無關」的「資產階級革命」又是什麼呢？

與河野一起對法國革命進行研究的桑原武夫，將明治維新定為根據「要求鞏固的獨立和大膽地實現近代化的熱情」而完成的「後進國家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指出它是「自上而下」進行的，

並強調「大凡後進國家迅速進行改革時，『自上而下』是不可避免的」（桑原武夫：《傳統與近代》，文藝春秋，1972年，第254、267頁）。如果是這樣的話，在日本「自上而下」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權力主體又是什麼呢？

所謂「自上而下」進行的，與「民主主義」「無關」的「後進國家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歷史上，首先是十八世紀後半葉作為歐洲後進國家的東歐各國所出現的啓蒙絕對主義的改革，接著就是十九世紀後半葉，在亞洲之一角的後進國家日本的明治維新中，由啓蒙思想家加藤弘之以普魯士的啓蒙絕對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¹⁹為榜樣所提出的改革內容。美國的歷史學家漢斯·羅森堡，追溯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普魯士的絕對主義自「王朝絕對主義」(dynastic absolutism)向「官僚絕對主義」(bureaucratic absolutism)過渡的情景，並描述了在其發展的頂點，斯坦因²⁰和哈登堡²¹因受法國革命的衝擊而完成了所謂「來自內部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within)和「來自上面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的過程。(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

6

¹⁹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1740~1786年在位，提倡以「開明專制」即「啓蒙專制」精神進行改革，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由增加國家收入來鞏固君主專制制度，擴軍備戰，加緊對外擴張。

²⁰ 斯坦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Stein, 1757~1831)，普魯士首相(1807~1808)，任內進行一系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改革，如解放農奴的人身依附關係等。

²¹ 哈登堡(Hardenberg, 1750~1822)，1810年繼斯坦因任普魯士首相，繼續推行改革，曾以苛刻的條件准許農民贖買封建義務，建立柏林大學，實行義務兵役制等，改革有利於加強普魯士的國力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極不徹底。

～1815. 漢斯·羅森堡著：《官僚政治、貴族政治與專制政治——普魯士的經驗》，Beacon Press, 1966 年，第 18～19 及 203 頁。）日本的西洋史學家成瀨治根據所著《世界史的意識和理論》（《世界歷史叢書》，岩波書店，1977 年）中談到的對世界史的鮮明認識，寫成《走向近代歐洲的道路》（《世界的歷史》第十五卷，講談社，1978 年），在敘述奧地利啓蒙絕對君主約瑟夫二世進行改革的一節，曾冠以「王位上的革命家」這個標題，聯繫其發布解放農民的命令，把他同普魯士的啓蒙絕對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加以比較，指出「約瑟夫的作法確實激進，可以稱爲『來自上面的革命』」（第 342 頁），還探尋其本質，論述啓蒙絕對主義，並將其與明治維新加以比較。他說：

「……所謂啓蒙絕對主義，在像扶植保護工商業的『福利國家』政策、宗教政策、教育政策等一切方面，都表現爲一個『監護性國家』。它把人民看做政治上還不成熟的人，而要由『啓蒙的』君主在『健全的理性』的名義下，對一切事情實行來自上面的權威性的領導與限制。這或許確實是『爲了人民』而進行的統治，但却遠遠『不是由人民』進行的統治。

「這個意義上的『監護性國家』，乍看起來具有『近代的』因素，但它是君主通過絕對主義體制的合理化，努力於使資產階級尚未成熟的『後進』社會迅速實行自上而下的『近代化』，並由此產生的『警察國家』。就這一點來說，它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有類似之處。但必須指出，它由於缺乏憲法和議會政治，故與日本相比，就更具有前近代的性質。」（第 345～346 頁）

成瀨是把擁有憲法和議會政治的「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與約瑟夫二世的啓蒙絕對主義相比較。但是，如果把尚未實行憲法和議會政治而實行了四大改革時的明治維新，與約瑟夫二世的啓蒙

絕對主義相比較，豈不是更為直接，更能使我們聯想到日本的啓蒙絕對主義嗎？這裡，讓我們再回到桑原和河野的論點上來。他們兩位在共同研究歐洲先進國家法國的啓蒙思想及法國的革命時，為什麼沒有注意到，作為歐洲後進國家的東歐各國與此相應的動向呢？為什麼沒有注意到，在受到西歐衝擊的東歐各後進國家中，作為由西歐化而推進近代化的權力主體的啓蒙絕對主義呢？問題的根本就是：沒有追溯到十八世紀的東歐各國，把後進國家在西歐的衝擊下完成的「後進國家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放在世界史的範圍內來加以考察。當然，東歐各國啓蒙絕對主義所完成的改革，能否叫做「來自上面的革命」還是個問題。約瑟夫二世的改革——如本卷第四章所述——因受法國革命的衝擊而夭折，這就表明，成瀨所形容的「來自上面的革命」不過是子虛烏有罷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同「來自上面的革命」相聯繫，正在於絕對主義自「王朝絕對主義」過渡到「官僚絕對主義」，強有力的官僚能夠靈活地對付法國革命帶來的衝擊。東歐各國啓蒙絕對主義問題，與其說是資產階級革命問題，倒不如說是為對付西歐的衝擊而實現近代化的改革問題。因此，追溯十八世紀的東歐各國，在世界史的範圍內考察「後進國家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其意義，嚴格說來正在於由此而產生了後進國家為對付西歐的衝擊而實行近代化的問題。如果像桑原所指出的那樣，明治維新的變革「不用說也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民族有多麼巨大的激勵」（桑原，前引書，第254頁）。那麼，「激勵」後進國家日本，使它完成了明治維新變革的，則是歐洲的後進國家普魯士——後來是俾斯麥^②的德國。日本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完成的明

^② 俾斯麥 (Otto Bismarck, 1815~1898)，德國貴族出身的政治家，1871年在普法戰爭中獲勝後統一德意志，任德意志帝國宰相，對內鎮壓工人運動，對外企圖確立德國在歐洲的霸權，有「鐵血宰相」之稱。

治維新變革，與普魯士和奧地利在十八世紀後半葉完成的變革相隔了一個世紀，因而能吸收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在變革的內容上，也提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但主要還是出於外交和財政上的需要。概括來說，後進國家的日本，受到歐洲後進國家的「激勵」而完成了明治維新，而亞洲各後進國家在已成為亞洲先進國家的日本的「激勵」下，卻不是沒有實現其變革嗎？十八世紀東歐各國和十九世紀日本的「後進國家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都是在啓蒙絕對主義成為權力主體的情況下完成的，但作為二十世紀的革命，亞洲各國的革命卻沒有再次把啓蒙絕對主義當作權力的主體。

- 8 神山茂夫曾經就國家和帝國主義的問題提出過嚴厲的批評，使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此後，我在工作中總是考慮如何聯繫神山的批評來進行。在本卷中，我自己提出的課題之一，就是要對神山的批評中與國家論有關的部分，作出我的回答。神山雖已去世，但弄清這些問題則是我對學術界應盡的義務。在下一卷中，雖然還將繼續就國家論作出回答，但也提出帝國主義的問題以作為該卷的主要內容之一。

信夫清三郎

1978年5月6日

目 錄

凡例	1
序	1
第一章 王政復古	1
第二章 內亂	135
第三章 神政絕對主義	201
第四章 啓蒙絕對主義	301
第五章 立憲絕對主義	453
索引	519

第一章 王政復古

3

長州高杉晉作有當今洛西^❶第一
卓識家之名。其主張謂，英法當今以
十分強盛之勢，注視支那之衰政，欲
堂堂正正取勝之。日本現今如欲以此
為榜樣，則為大謬。蓋今日可為我榜
樣者，乃英法等國方興未盛之時。其
時戰爭頻仍，此之不學，何益之有？
此乃名論，亦某之攘夷說也。

——中岡慎太郎：《秘示知己論》
(1866 年)

一

十九世紀四〇年代，1848 年革命在歐洲大陸上把政治革命引
向了新的階段；十九世紀四〇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尋求新階
段的政治革命方向而起草了《共產黨宣言》；十九世紀五〇年代，
英國為紀念產業革命勝利而在倫敦舉辦第一屆國際博覽會；十九
世紀五〇年代，克里米亞戰爭把本來不屬於歐洲的非基督教的伊

❶ 洛西，指京都以西。